



聚焦
jujiao



公益行动
gongyixingdong

《中国公众捐款》近日发布——

公众捐款偏救济 “理性捐赠”需培育

本报记者 顾磊

中国慈善联合会数据显示,2017年至2019年,我国接收境内外捐款捐赠呈持续上升趋势,分别为1499.86亿元、1624.15亿元和1701.44亿元(均为人民币)。随着慈善事业规模逐渐壮大,困扰慈善业的一个基础性问题,究竟是哪部分公众在向慈善事业捐赠?

由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基金会中心网统筹协调的中国公众捐款研究项目,从2018年底开始,经过两年的努力,综合来自北京、浙江、吉林、江西、四川、甘肃六地的抽样调查数据以及京沪浙等地5个机构和平台的案例,对公众捐款特征及其文化内涵进行了全面扫描,于近期发布了新书《中国公众捐款》。

据悉,这是我国首次针对公众捐款开展的大规模专题研究,回答了“谁在捐、怎么捐、捐给谁”的问题。

谁在为慈善捐赠?

2016年至2018年间,39.31%的公众捐过款,32.54%的公众在2018年度捐过款。平均每年捐款额度为109.39元,捐款次数为1.04次。如果按此比例进行统计学推算,2018年中国公众捐款总额为1526.35亿元。该额度与中国慈善联合会的统计数据相差较大,研究团队指出,这可能是因为由于本次统计的捐款中,较大比例的部分来自个人互助。从年平均捐款额就能发现,公众捐款以小额捐赠为主。《中国公众捐款》显示,在已捐款的被调查中,30.08%的捐款者年平均捐款额为50元及以下;55.41%的捐款者年平均捐款额为100元及以下;只有9.63%的捐款者年平均捐款额超500元。

一个值得注意的角度是,公众的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捐款。统计结果还显示:“随着职业身份的日益多样化,相对于单位动员性捐款而言,自主性捐款有了更多成长空间。”

另一个有趣的发现是,收入与公众捐款数量显著相关。与中高收入群体相比,低收入群体捐款占收入比重最高。随着收入的增加,这一比重逐渐下降。然而,等到收入增加到一定规模时,该比重又再次上升。

调查也显示,不少受访者有志愿服务的经历,个人捐款和志愿者经历高度

正相关,志愿服务与慈善捐赠相互强化。首先,从人群比例来看,志愿者群体捐款比例比非志愿者群体高出两成;其次,从捐款频次来看,志愿者过去一年的平均捐款频次比非志愿者约高出0.5次;再次,从捐款金额来看,志愿者过去一年的捐款数量要比非志愿者高出200余元,高出了八成左右。

研究表明,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信任直接影响到慈善捐款行为、捐款数量、捐款领域和捐款行为,信任程度越高,就越会直接向慈善组织捐款,也更加倾向于选择定期自动扣款,这也说明了慈善组织公信力的重要性。

公众为什么要捐款?对已捐款公众调查显示,捐款者对捐款环境的满意度要高于非捐款人。研究团队认为,内在价值的实现是公众捐款最重要动因。对于非捐款人来说,他们往往强调自身经济条件、身边氛围的影响。因而,公众捐款的政策、组织、交往圈等环境亟须改善。同时,提升慈善透明度与可信度、加大倡导力度是促进公众捐款的有效途径。

捐到哪?捐给谁?

给网络互助平台捐款是中国公众捐款的主要方式。55.5%的公众倾向于通过轻松筹、水滴筹等网络个人求助与互助平台进行捐款。此外,选择向受益人直接进行捐款方式的比例接近1/3,而向慈善组织直接进行捐款的比例较少。

公众捐款前3位的受益对象人群分别是儿童青少年、残疾人和老年人。其中,儿童青少年作为受益对象的比例(41.4%)超过其他各类别之和。公众捐款的受益对象多数为陌生人(59.9%),但面向熟人捐款的比例仍高达31.6%。

医疗健康、减灾与救灾、扶贫与发展是2018年度公众捐款最多的三大领域。从捐款领域的比例分布来看,中国公众捐款带有较强的救济扶贫取向,偏重于生存和救助性而非发展性的需求取向,这与国际上公众捐赠行为取向有较为明显的差异。

“公众捐款带有很强的救济扶弱取向,偏重于生存和救助性而非发展性的需求回应。”调研团队负责人表示,“现代慈善和互联网慈善中依然流淌着大量基础慈善和互助的古老基因。因此,慈



指尖公益已成为公众捐款的主要方式。

本报记者 顾磊 摄

善文化也是横亘在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面前有待发掘的宝藏。”

研究者敏锐地注意到,互助保险可能对公众慈善捐款形成挤出效应。以广东省汕头市存心慈善会为例,该机构善款收入从2010年的1434万元增长至2017年的4506万元,然而,自2016年该机构与轻松筹合作发起互助性的“存心筹”以来,一些其他项目的善款收入明显下降。

公众不太关心“捐之后”

2020年腾讯“99公益日”期间,腾讯公益平台共完成筹款23.2亿元,捐款人次达5780万余次。毫无疑问,互联网已成为公众捐款的主要渠道。此次调查也显示,尽管相当比例的公众愿意直接捐给受益人(选择“直接捐给受益人”的受访者占32.4%),但也是通过社交媒体的方式来实现。

《中国公众捐款》指出:“一般而言,捐款的规律性越强,慈善事业越稳定。例如,月捐人数越多,说明组织黏性越强。组织黏性越强,对组织化慈善的支撑能力越强。”然而,调查发现,大部分被访者捐款行为的规律较弱,仅有1.9%和1.1%的被访者分别表示每季度都捐和每月都捐。

2017年至2019年间,环保公益机构自然之友尝试探索定期定额的月捐模式,努力让月捐人数突破了1000人,然而月捐额度在机构善款收入结构中占比仍然不高。2018年,自然之友的年度总收入为991.36万元,其中,公众捐款额为98.07万元,而月捐额度不到29.8万元。

上海联劝网是民政部指定的首批慈善组织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之一。截至2019年2月,该平台的捐款人达到60万人。平台有项目、活动、月捐三大核心捐款板块,但88%的捐款流向的是“活动”。

研究团队指出,仅有16%的受访者选择“直接捐给慈善组织”。这说明慈善组织及其公益项目与公众之间仍有一定的距离。

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善款后续使用情况关注度并不高。调查显示51.1%的捐款者在捐款后不会特别关注后续信息。仅有3%的捐款者表示会主动搜寻各类求助或募款信息,65%的人从不主动搜寻,也就是说,捐款行为大部分是基于被动或偶然接收到相关信息才出现的。《报告》也认为:“捐款者、受赠机构、受益人之间的纽带和良性循环仍比较脆弱,培育理性的公众捐款依然任重道远。”

金会等多家公益机构联合共建的好公益平台,在平台技术支持及中国扶贫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目前我们在省内25个县(市、区)有了合作伙伴。

在项目规模化推广时,我们体会到,不能简单地采用“我们拿出项目、资金和技术,当地机构只负责执行”的“帮运工模式”——如果有一天我们的能力跟不上了,当地伙伴就难以执行项目,服务可能会中断。我们希望通过项目在当地培养出一支成熟的公益团队,具备自我造血和专业执行的能力,哪怕我们撤出了,他们也能够继续服务好当地的孩子们。

记者:项目推广过程中,如何得到更多外部助力和支持?

康勇忠:在全省规模化推广过程中,有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政策倡导。比如,湖南省政协常委、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张庆和连续5年撰写相关提案被媒体报道,我们的项目在全省的影响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在规模化推广的过程中,也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

我们与政府部门保持联动。比如,我们去某地开展项目,一般都是在当地民政部门提供的困境儿童名单上进行筛选和走访,这节约了执行成本。团队开展走访、款物发放和陪伴等工作时,与当地共青团组织合作,当地团委的干部会带志愿者去孩子家里,既节约了时间成本,又让服务对象增加了对我们的信任度。

记者:当前,事实孤儿服务领域的公益服务是否不足?

康勇忠:从全国范围来看,业务涉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的机构不多,专注于提供该类服务的机构就更少。从成长的角度来看,孩子所处的家庭环境不一样,其心理问题、表现特征和需求也不一样,因而需要专门的服务方法。我认为,针对困境儿童的服务应该细分领域,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精准服务。

此外,专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服务的公益机构专业能力也严重不足。今年开始,我们将为全国范围内的伙伴提供技术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发展,更好地服务孩子们。



专访
zhuanyang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帮扶——

社会组织可提供有效补充

本报记者 顾磊

民政部近期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扩大了保障对象范围,并要求“确保符合条件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应保尽保”。

在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帮扶方面,社会组织正在形成助力。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公益文化促进会的品牌公益项目“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目前已覆盖湖南省多个县(市、区),服务着近1600名孩子。

项目服务的孩子中,有10%左右的受助对象是政策文件界定范围内且在享有政策保障后家庭经济收入较去年支出数额不超过1万元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另外约90%的受助对象目前尚在政策保障之外,是父母一方去世,另一方因再婚或特重大精神疾病无法履行或放弃履行抚养义务的儿童。可以说,在政策尚未或难以覆盖的地方,项目提供了精准补充。

“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如何从一个区走向全市乃至全省?其专业方法与经验是否有可供学习与借鉴之处?记者专访了该机构秘书长康勇忠。

记者:如何从一家机构做到解决岳麓区全区问题?

康勇忠:大爱无疆使命清晰,专注于帮扶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尝试真正地解决问题。项目依托民政、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开展,节省了成本与资源,容易取得成效并得到推广。

我们以区县为单位逐步推进,例如对岳麓区在服务范围内的孩子实现全覆盖后,我们才开始做另一个区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有四大类。我们重点选择其中父亲去世,母亲改嫁或者失踪、失联的这一类,精准服务,做出



“逆风飞翔·事实孤儿同行计划”的麓山少年成长营。 本报记者 顾磊 摄

成效。

从项目设计来看,我们最开始做助学,后来逐渐调整为陪伴孩子成长。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项目目标升级为培养孩子独立人格与融入社会的能力,得到普遍认可,这也是项目得以在岳麓区全区铺开并产生成效的主要原因。

记者:项目扩大规模的主要方法与经验是什么?

康勇忠:在岳麓区做完以后,我们逐步在长沙市开福区、芙蓉区、雨花区、天心区实现全覆盖。当项目往省内其他地区扩展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团队去当地执行项目缺乏动员当地资源的能力,执行成本也很高。我们调整策略,尝

试寻找当地公益伙伴机构合作。

我们与浏阳市、娄底市新化县的两个伙伴团队合作了两年。我们负责技术,他们负责项目执行,成效显著。当我们后来在全省招募伙伴机构做规模化推进时,采用的都是这种合作模式。

随着业务在各地逐渐铺开,我们发现仅仅提供项目和技术支持还不够,开始支持伙伴机构开展4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机构规范管理、项目专业执行、项目品牌与筹款能力、财务管理。同时,我们还提供了筹款配资等方面的激励。公益伙伴机构的执行能力逐渐有了明显提升。

2018年,我们加入由南都公益基

“让慈善成为最美的教育”

——江苏常熟“慈善文化进校园”计划侧记

本报记者 舒迪

新春伊始,随着近日江苏省常熟市报慈小学等三所学校被确定为“校园慈善文化建设示范教育基地”,常熟“慈善文化进校园”3年行动计划进一步结出丰硕的硕果。

有着“江南福地”之称的常熟,其慈善文化既有深厚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又有鲜活的生活魅力与时尚风采。

“慈善之美在于人心之美、地域之美、文化之美。”常熟市慈善总会会长徐永达告诉记者。

常熟市慈善总会成立于2001年,是江苏县(市、区)级慈善总会里的“老字号”,但这家慈善“老字号”,在推广新时代的慈善文化中,却有思想、有创新、有妙招。

2020年4月,常熟市慈善总会联合市教育局正式发布《“慈善文化进校园”三年行动计划》,在该市中小学广泛播撒慈善的种子,培养中小学生学习、仁爱、明辨、笃实的优良品格,营造向上向善的校园文化氛围。

“推动‘慈善文化进校园’的根本目标,在于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从小发现和理解善意,感恩并实践善行,从而树立懂得感恩的精神品格,养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慈善行动的良好生活方式。”徐永达说。

在各方的合力推动下,时至今日,在常熟市的许多校园里已经结出了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慈善文化硕果。

常熟市报慈小学的“日行一善,培养美德好习惯”教育活动,鼓励学生们“日行一善”,并在此基础上,每月完成一篇孝心日记;常熟市梅李中小

学展出非遗传承人创作的《二十四孝》红木浮雕,供学生们日常观赏学习;常熟市孝友中学开发了《孝友德育》等教材,为该校乃至全市广泛开展慈善教育打下基础。

“慈善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从娃娃抓起,要让慈善成为最美的教育。”徐永达说。

早在2018年,常熟市慈善总会就提出要将在慈善文化引入校园。同年,常熟市辛庄中心小学的教学楼里建成了一条“百米慈善长廊”,目前已成闻名遐迩的人文景观,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长廊内容丰富多样,一个个爱心故事、一条条学生心语、一幅幅慈善图片、一篇篇慈善文章,如春风化雨,沁入学生身心。

除了通过构建独特的校园慈善场景,占领校园橱窗、黑板报等阵地以营造慈善氛围,“慈善文化进校园”还通过主题书画比赛、慈善征文比赛等活动,进一步推进与莘莘学子全方位深度融合。

与此同时,慈善文化进校园,还力推将“善意”落实到行动。常熟市各学校除了要结合自身特色,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献爱心活动外,也倡导各校教职员工积极开展志愿服务,树立良好的师表形象。

“我们还计划定期举办慈善主题活动,例如慈善人物慈善故事分享会、朗诵会、书画展、慈善夏令营等。”徐永达表示,常熟市慈善总会下一步将牵头吸纳若干学校建立慈善校园联盟,助推形成覆盖全市校园的“慈场”。

北京再次获捐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站

本报讯(记者 舒迪)2月18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携手伊利集团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捐赠1套“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站”(核酸检测亭),助力节后复工的疫情防控工作。至此,中国红基会已累计向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捐赠7套“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站”(核酸检测亭)。

据介绍,“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站”(核酸检测亭)是由中国红基会按照疫情检测需求定制的核酸采集、工作防护设施,占地仅2平方米,采用生物实验室级别的不锈钢密封箱体、钢制密封门、洁净新风、手套接口,工作站具备10-15pa微正压、取暖设备和外倾角工作窗,有效阻止外部气流进入。检测采样人员可以在相对密闭的工作站中,通过袖套进行采样操作,与受检人员实现接触隔离。“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站”(核酸检测亭)在保障医护人员健康与安全的同时,提升了检测采集工作舒适度。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形势下,为确



活动方供图

保春节期间各地按照防疫要求有序复工复产,北京各医疗机构核酸检测压力增大,冬季医务人员长时间在户外采样,工作异常辛苦。”中国红基会相关负责人表示,“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站”能为医护人员提供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

据记者了解,首批“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站”于去年6月28日投入使用。截至目前,中国红基会已向北京、天津、新疆、河北等地捐赠26套“红十字应急救援工作站”,助力当地疫情防控。

平安“村医工程”3年义诊服务超11万人

本报讯(记者 赵莹莹)平安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近日发布的《2020年度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显示,2020年,健康扶贫项目“村医工程”义诊覆盖超11万人,多版服务成果彰显了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价值和成效。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作为互联网医疗企业,平安健康医疗科技调动多方资源,发挥互联网医疗高效、便捷、无感染风险的独特优势,从在线问诊、物资驰援、药品保障、在线教育等方面支持社会公众抗击疫情。企业成立了新冠肺炎抗疫专项小组,开通抗疫在线问诊专区,并与全国各地的政府部门合作,提供新冠肺炎实时在线以及电话义诊服务。疫情高峰期间平安好医生平台访问总人次达11.1亿,抗疫科普视频全网播放总量超1.15亿次,助力线上抗疫。

此外,平安健康医疗科技还向武汉等多个省市的医疗机构捐赠口罩45万只,针对慢病用户推出慢病用药服务专区,与物流供应商加强合作,保障疫情防控期间慢病患者用药的时效性,为抗击疫情全力贡献。

平安健康医疗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2018年以来,该企业持续落实平安集团智慧扶贫工程“村医工程”,深入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地实施健康扶贫工程,研发平安好医生“村医版App”,引入检测一体机等智能医疗设备升级乡村卫生院,大大提升了健康扶贫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据了解,过去3年,“村医工程”援建、升级了1228个乡村卫生院,义诊覆盖超过11万人,有效提升了贫困地区医疗服务水平,提高贫困地区人民健康素质。

友成基金携手腾讯共推乡村编程教育普及

本报讯(记者 郭帅)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与腾讯青少年科技学院日前达成战略合作,携手推进“编程·创未来”项目。双方将以编程教育为切入点,共同助力乡村地区科技教育普及。

双方此次达成的战略合作,将以乡村编程教育为起点,合作研发面向乡村教师的《创未来—创想编程基础课》并跟进课程在乡村地区的使用情况,集合双方资源携手推进“编程·创未来”公益项目,并将持续探索科技教育公益之路的发展方向与跨界领域的深耕与合作,赋能乡村教师,助力乡村孩子多元发展,共同探索乡村科技教育普及的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国务院参事、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表示,乡村地区科技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编程·创未来”项目大有可为。腾讯高级副总裁奚丹表示,希望以腾讯的技术能力与前沿探索为依托,探寻适合中国的“科技+教育”的新模式,推进“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教育赋能模式,助力教育公平化、个性化、多元化目标的实现。

据悉,“编程·创未来”公益项目自2019年由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发起至今,已在重庆市彭水县的5所学校进行试点。此外,项目还通过系列编程普及活动,为乡村教师提供编程设备、教师培训、活动奖励等支持,惠及1000余名乡村教师。